

吴征镒院士与王元化先生

陆晓光

(1954~)，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吴征镒院士对王元化研究中心的鞭策

我有幸受到吴征镒院士的教导，是因了业师王元化教授的缘分。

1989年夏我蒙元化师引荐，作为教育部“中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员赴日留学，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教授任文学部长的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以客座讲师身份研习。其间元化师常来信督导。大约翌年暑期元化师嘱我协助查阅日本文献中关于“扶桑”的解说。我随即于所在大学图书馆通过查阅日本辞书等完成了任务。记得元化师回信中说：“日本辞书扶桑条较我国详细，持论亦较妥切。这真令人感慨。”（大意）此后我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东亚研究所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1992年7月回国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继续在中文系任教。该年元化先生发表《扶桑考辨》文，之后我在元化师题签授我的《清园论学集》中读到，其中言及：“最近，晓光曾代我查访日本有关扶桑资料，他寄来一些辞书条文，其中最为详尽的是《日本历史大辞典》。现摘录这部词典‘扶桑国’条释文如下：（略）”。紧接其上的则是另一段关于吴征镒先生的引用：

……我曾向友人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授请教，他回信说：《梁书·扶桑传》所载，扶桑“叶似桐”等语，殊不类今之木棉（攀枝花、英雄树、红棉，原产东南亚，*Bombax caiba*，原产中东南亚。），二者均属木棉科。因未闻兹二者如传文所说“初生如笋”，可供人“食之”。二者种子上绒毛可供填充，作絮作枕，但非如传文所谓“续其皮为布”。传文所指当然也不是今中南美所产木本“棉花”（海岛棉与陆地棉）。棉属各种也不是如传文所说“续其皮”的。可以断言，日本及附



吴老在王元化、张可夫
妇家中

近岛屿决无类似“扶桑”的植物¹。

这是我的初知“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授”。中国古代一直把扶桑当作神话中的树名,《说文》:“扶桑神木,日所出。”既然是“树名”,就现代科学研究而言当有植物学证据,而后者非参照植物学家的论断莫当。因此我认为元化先生《扶桑考辨》中最有力依据当属上引这段出自植物学家的论断。这段引证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以前很少在文史哲考辨类文章中读到引用自然科学专家的论断,并且元化先生还是直接向“友人植物分类学家”请教(后来我了解到吴征镒教授是中科院资深院士)。作为人文学者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有可以直接请教的友人,这于我也是前所鲜闻。元化先生该《扶桑考辨》还收录于《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清园文稿类编》(《考释篇》,华宝斋书社1999年)、《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历年出版物中,并且这些书多有题签授我。因此我是多次奉读该文,上段引文中的“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授”也于我印象益深。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筹划王元化化学馆和成立王元化研究中心的过程中,我受命担任主事。其时做的第一件事是编辑纪念文集《清园先生王元化》(该书翌年5月9日王元化研究中心成立挂牌前出版成书)。在编辑过程中我油然想到是否也可写信报告吴征镒院士,抱着斗胆一试的心情致信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令我惊喜的是,很快收到吴老助手吕春朝先生的肯定回示。吕春朝先生比我年长,在与他通过程中得知,吴老研究植物学历时70余年,任《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主编和《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1980年后相继受聘为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瑞典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等;1999年获“考斯莫斯国际奖”(International COSMOS Prize 1999;该奖在国际植物学界相当于诺贝尔奖,吴老为该奖的中国首位获奖人);又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此我才意识到,吴老不仅是中国植物学专家,而且也是享誉国际学界的中国自然科学家。不久我于征稿启事约定之日前收到吴老《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专文,还得知该文是时年92岁的吴老坐在轮椅上口述,由多名助手协助笔录,断续撰写并反复修订而成。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吴征镒院士与著名人文学者的王元化教授,其间而有“老友”关系更令我若有所感。

读该文又始知,吴老与元化先生最初相识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回忆1947年在北平初与王元化交往,有数次在清华园的教职员宿舍区相谈,其实我心里明白元化早是中共党员了,我们之间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而元化先生晚年也回忆:“抗战胜利后,我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时,常常和在清华任教的吴征镒……等一起到郊外游玩。”²元化先生曾不止一次说他是“汲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精神乳汁成长”的。而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读书成长的吴老当年也是中共地下党!这样的“老友”,更令我感到意味深长。

吴老该文对元化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评议:

他又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过精深研究,多次发表有关反思的专文,追寻“五四”以来的各种极左思想的根源,并作深刻反思,对当代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发表独到见解,这是他一贯信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为人钦佩。

其中触及“各种极左思想的根源”问题,正是元化先生晚年最役心力之所在。吴老作为自然科学家而对王元化晚年学术思想的最重要方面中肯鉴识,可以想见这对“老友”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

1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第511-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第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方面也有相当共鸣。其中又明确表达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钦佩，后者也正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的精神依托之所在。这个精神依托源出上世纪初的清华园，而吴老与元化先生的相见相识始于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的任教期（吴老读大学最初也是在清华园）。吴老特别述及：“元化的童年多在清华园度过”，“无怪乎他集编《清园文稿类编》，标以‘清园’，是与清华园有着深切渊源之故。”可见吴老对元化先生与清华园的渊源关系也是颇有所识。我当时有幸将吴老该文置于《清园先生王元化》全书首篇，今天回瞻起来可以说，《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不仅提供了某种学术借鉴的高度，更包括“有学术的思想”的引导。

2009年5月9日王元化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吴老派遣了吕春朝先生从昆明远道来赴会。记得那天上午我与吕老师见面时，他已经参观了初步建成的王元化馆内“清园生涯”“清园学术”等展厅。展厅中有一幅“抗日青年与国文老师”主题展板，其组图之一是吴老伏案研读植物类样本的照片（来源新华网），左侧为赵朴初手书赠吴老的墨字图片（吴老提供的电子版）。这个组图的立意也是受到吴老2000年在上海讲学期间“三晤元化”一段回忆的启发：

此次沪上逗留期间，应元化之邀到寓所相聚，还得享用他的夫人张可主理的精细午餐，茶余饭后时，见客房壁上悬有赵朴初的圆形条幅，我早有寻求赵朴老墨宝的心愿，即请元化代向赵朴老索书，他真的为我求到赵朴老的手书，为我了却心中大愿，1987年7月赵朴老亲书访曲江狮子岩马坝人故址的三首诗惠赠于我：“洞里观湖更看山，置身十二万年前。漫夸子寿文章好，马坝人群是祖先（张九龄曲江人字子寿）。石器旧新相去远，古来进化路漫漫。那知电子新时代，换斗移星刹那间。温故知新知未来，勤劳改造勉吾侪，残枝片石须珍重，无尽星河自此开。”此珍贵条幅成为我收藏的佳品。元化在蒙冤时期，潜心书海，与夫人张可一起翻译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字，后汇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长期困厄境遇之中，元化身心多受折磨，留下不少毛病，在家中时由按摩师作按摩，以减少身体不适，恢复体力，但元化学术研究的精力不减，仍如过去一样，让我心悦诚服。（《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

自然科学家的吴老与人文学者的元化先生如此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令我感动之余油然想到元化先生《思辨录》一段话：“爱因斯坦是本世纪最为杰出的人物，他比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更多地体现了本世纪的人文精神。”杰出科学家吴老的人文襟怀，应该有助于理解元化先生格外心仪的“本世纪的人文精神”。

令我尤感亲切的是《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的卒章：

华东师范大学陆晓光君主事该校“王元化研究中心”，来函告有元化诸弟子潜心研究元化精神，仅此忆文复之，敬表对元化、张可的思念和祭悼。

我于吴老从未有幸拜见，相隔距离也远非后生之于前辈。因此这段直呼“诸弟子”的语气令我迄今感觉沉甸甸。今年5月9日是元化先生去世六周年，也是王元化研究中心成立整五年。如果说我作为“主事”而始终未敢有怠懈，那么驱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吴老的殷切期望和鞭策。

二、读吴征镒院士的中国文化情志

感谢吕春朝先生赠送的吴征镒院士《百兼杂感随忆》³（以下简称《随忆》），这部卷帙厚重

3 《百兼杂感随忆》，吴征镒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选，吕春朝任常务编委。该书由王元化研究中心常务助理罗一佳硕士赴昆明植物园采访时获赠带回。参见罗一佳《王元化与植物学家吴征镒的文艺情缘——暑期访吴征镒、吕春朝先生》，载《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11年9月6日。

(80余万字)的文集收录了吴老专业论著之外的纪事、怀人、序跋及诗词随笔等各类文字。《随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文集,对于中文专业的笔者而言,最鲜明特征是处处可见古典诗文印迹,在洋溢中国文化情志。其中甚至不乏“曹操《短歌行》别解”“清诗选译赏析”这类通常属于古典文学专业文献的标题。该书令我由此深切感触到吴老与元化先生之所以成为“老友”的潜在缘由。

其中《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自序(2002年)是以引古人诗句开首:

“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第451页)。

该对句为朱熹七言绝句《春日》的后两句,前两句为“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通常认为这是一首哲理诗。其中“泗水”暗指孔门,因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寻芳”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朱熹是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染万物的春风。对于常年在山区野外进行实地考察的吴老而言,当意味着吴老的植物学生涯是伴随着古典的诗情画意。这个引诗开首的方式也与元化先生《清园论学集》自序不谋而合,后者所引是“学不干时身更贵,书期供用老弥勤。——录汪公严诗句”。(汪公严是清华园早期国文教师,也是清华大学校歌词作者,曾为青年王元化讲授《文心雕龙》等)。

吴老《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的自序(2005年)也是以引诗开篇: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第474页)

这首清代画家郑板桥《竹石》诗也正是元化先生授笔者《清园论学集》的扉页手书所题。吴老该《自序》中写道:“我的前半生适逢两次世界大战,国内又是军阀混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而后树欲静而风不止,又逢‘十年动乱’,……60岁后欣逢盛世,二十余年未浪费时光,乃能磨成一剑”(第483页)。而元化先生该序中也感慨:“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传统,两位前辈都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都殊途同归地以郑板桥该诗作为治学良箴。如果说对于人文学者的元化先生而言引用该诗是自然而然,那么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吴老而言,则多少意味着中国古典资源的某种新颖价值。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自序(2006年)的开篇是一首集句诗:

性本爱丘山,守拙归田园。结庐在人境,闲室有余闲。

俯仰终宇宙,欲辩已忘言。纵浪大化中,复得返自然。

——偶集陶渊明句,成一五律以之自况(第491页)

从《随忆》中可知,吴老最初是在幼少年时代扬州家中“芜园”中产生植物学兴趣,成年后树立“弄清全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的志向。1958年“大跃进”年代,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吴老毅然申请举家从北京南下,从此在中国植物资源最丰富的云南地区遂其毕生之志。吴老写该集句诗时已年逾90岁,其植物学生涯也完成了总结性工作。该自序结尾写道:“此书所用资料实是无数有名或无名英雄的血汗凝成,也是大自然在种子植物演化过程中的实绩。”可见陶渊明“闲室有余闲”的古典意境,在吴老笔下已然饱含毕生在科学研究的山路上辛劳攀登的凝重血汗。

吴老毕竟是植物科学家,中国古典诗文的意境在其著述中是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呈现。《〈观赏竹类〉小引》(2006年)写道:

观赏竹类的文化内涵到唐、宋,已达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东方文明(其同义语是植物文化或更具体的“竹文化”)的精髓。一言以蔽之,曰:“虚心、劲节”。这就是“耿介拔俗之际,潇洒出



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⁴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气质”的最高境界。今人以为，它是“观赏竹类”的文化内涵，然而这是拟人化的。“气质”是人赋予的，于竹何有？（第490页）

这段评论不同于古典竹文化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了竹物“气质”是人所赋予，而非其本有；从现代植物学角度言之，这段评论中的见识显然超出西方植物学的“竹类”视域。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吴老赞同并引鉴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之说：“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是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然而吴老别有一种补充：“科学技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第199页）这里的“祖国”显然不是地理概念，“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命题之依据，从上引吴老对“竹类文化”的阐释中可见一斑。

即便在纯植物学研究范围内，吴老所见也随处显现古典文化学养的慧识。《菊花鉴赏与培育序》序（2001年）开首曰：

“鞠有黄花”，夏小正月令已载。夏小正月令乃夏代月历，今存大戴礼记中，礼记所云，乃汉人杂战国五行家说。当时盖无菊字，但已知用人民喜见熟知的野菊花观赏物候。（第449页）

其中论断所据的《大戴礼记》，是须有古文献研究专业素养者才能读。

又《诗经》首篇《关雎》章句：“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其中“荇菜”历来注疏文献多释为“荇菜”，植物科学家的吴老却提出质疑：

荇菜现今都指睡菜科的 *Nymphoides* 属植物，这种植物是浮水的，紧紧地不大分枝，开五个合瓣的金黄色花，在水面上比菱显眼，与白萍 *Hydrocharis* 黄白相印成趣，采它只需一把捞起。千古以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国没有吃它的记录。我个人认为绝不能当作荇菜，因为它不是菜，只能“左右芼之”，没有“参差”而沉水的茎，不用“左右流之”，“左右采之”。（第560页）

这段结合现代植物学的考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诗经》研究者而言，足称难得之新见。

吴老是《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和《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因此研读中国古典文献不是专业外的余事。因此吴老在读古书方法上也有其独到之见：

凡做一门学问，必先掌握这一门的已知文献，编大典就是古文献的汇总。知故温故，才能知新创新。例如读诗经，先读《诗草木今释》（陆文郁，1957）、《毛诗陆疏广要》（明，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晋，陆玑），结合《十三经注疏》（清，阮元），再去读诗经中有关草木的各条本文，这就都了解了各种不同解释。读《尔雅》也照样，从清代朴学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读起，结合近代有关知识，弄清各条，这是精读的一方面。（第220页）

其中所举书目，即便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者也未必人皆熟晓。而其中所言读《诗经》“草木”之名的方法，虽然是从植物学角度提出，却与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相关论述有所冥会。后者主张必须“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⁵

植物学的主要方法是实地考察和实物分析。在此实践领域，吴老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古典也有密切相关：

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

4 《文选》所载南朝（齐）诗人孔稚圭《北山移文》句。

5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第57页）

求知求是与实践永远没有止境，既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又要有“厚德载物”的气度。这两句清华校训，是个人终身受用不尽的。我已82岁而没有颓然，这就是主心骨。（第200页）

对一切学说，应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态度，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必定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我说了算。在民主中求科学，一切经过实验和实践的考验。……（第214页）

上引吴老对自己植物学生涯的总结，当也足为人文领域研究者借鉴。《随忆》编者前言指出：“吴老一生本着实践为先的宗旨，……提出了有东方人思维特点的学术建树。”这个概括中肯揭示了吴老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某种承传关系。

我读《随忆》才知道，吴老的中国文化情志更有直接的师承，其学业导师中至少有三位是中文专业的学者：闻一多、朱自清、余冠英。

读《深切缅怀浠水闻一多师》可知，吴老早年在西南联大时期之所以加入民主联盟并投入革命运动，首先是受到诗人学者闻一多的启蒙教育和精神激励。“那时我是闻师家的常客”，“闻师还介绍我参加了联大新诗社和剧艺社的活动。”（第247页）“‘一二·一’运动的最高峰是四烈士的大出丧，闻一多先师等教授队伍走在前头，……我主读祭文。”（第398页，《纪念“一二·一”运动六十周年》）“九死犹未悔，先生小屈原”——这是吴老1946年《哭浠水闻一多五章》中的两句（第233页）。

读《缅怀朱自清老师》可知，吴老考清华大学时的国文试卷是朱自清出题，入学后上过时任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朱老师的文风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以后写的科学论文中力求简洁，少说废话，少用废字。”（第328页）朱自清去世时是吴老代表清华教职员联合会写的挽联：“使贪夫廉，使懦夫立，求经师易，求人师难。”（第329页）

《悠长的怀念》是为纪念余冠英先生而写，其中回忆闻一多遭暗杀后的白色恐怖中，已经暴露地下党身份的吴征镒曾藏身余冠英老师家中，“他一家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的，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第271页）余冠英先生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清华的地下党员”。（第303页）令吴老始终不忘的还在于：

我在清华读书的第一年成了余先生家中的常客。四年中，每次我去总是留饭叙谈。当余先生得知我进清华得分最高的是国文和常识，而且国文判卷竟是教授大一国文的清华名教授扬州人朱自清先生时，十分高兴。他对我说：“文理相通，只有博大，才能精深，打好文学基础对学习生物也很有用。”我每次拜访，先生总要和我谈古文、古诗……（中略，第270页）

余冠英先生当年对生物系大一学生吴征镒说的这番话，也正是七十年后吴老《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的自述：“我与元化从事的研究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但我们交往中似乎融洽理解多于差异，大约是文理相通之理吧，其实博大才能精深，相通就在情理之中了。”笔者由此感悟到，吴老对元化先生的缅怀，也潜在着对早年受教的闻一多、朱自清、余冠英等国文老师的追思。

吴老缅怀老友王元化时提到王瑶先生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中的一个选题，即“把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十五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分别进行总结，按照时间序列，其中打头的是王国维，结



尾的就是王元化。”而读《随忆》可知，王瑶是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弟子”（第243页），抗战胜利后吴老回北平清华园再度组织“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其时活动“大都在王瑶家中聚会”（第273页）。因此《深切缅怀老友王元化》中分别有《寄沪上老友王元化》与《忆王瑶》两首七律诗。后诗的结句为：

闻朱事业谁堪继，惆怅滇池无髯翁。

据《随忆》可知，“闻朱”指闻一多与李继侗，后者为西南联大时期吴老的业师。“髯翁”指当时闻一多与李继侗都曾蓄须明志“闻师已长髯飘拂，李师仍短须一撮”，“他们二人实际上影响着我的一生”（第304页）。吴老当年还因李继侗老师推荐而投考与清华有“通家之好”的北大研究院，王瑶先生建国后也是由清华转入北大。由此推想，吴老《忆王瑶》时的“惆怅滇池”，是否也传达了期望清华北大一起考虑“闻朱事业谁堪继”的心声？

三、“英美式教育”中的科学精神

然而吴老毕竟是科学家。包括植物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科学体系很大程度上最初是从西方引进。所谓“科学”的观念、方法、精神乃至相关汉语词汇，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西方影响后的新文化运动产物。如果说自然科学较之人文学术具有更直接鲜明的现代“科学”性，那么吴老与元化先生在学术精神上的灵犀相通，是否也蕴含着超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因素？这个问题也是笔者期望有所新认知的。

就此而言，吴老写于2003年的《怀念汤佩松先生》中关于“自由主义者”的评议令我尤感瞩目：

他（汤佩松先生）的智力无疑是极高的，不免有些“自恃”，但是他的思想始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够脱离西方哲人一般主张的机械唯物论，始终没有突破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事物，去思考科学工作，这是他和闻一多先生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是佩松先生正是泮水闻一多纪念馆塑像的揭幕人，那时正当佩松先生90岁最后回乡。（第355页）

佩松先生是从自由主义到进化论为一个红线的内线工作，我多少受到党的教育，用辩证唯物主义尽力综合研究生物和生物圈的相互关系……。（第358页）

“自由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属于不同思想体系。吴老似乎认为，就思想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前者逊色于后者；而之所以比较逊色是因为其停留在“西方哲人一般主张的机械唯物论”。吴老上述评断的所据看来是建国以来通行的教科书观念。后者却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并期望重新认知的焦点问题所涉。

然而上引追忆中更瞩目的是吴老对“热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赞语。从吴老的怀念和相关资料可知，汤佩松（1903~2001）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早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的创建人，也是西南联大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创办人；曾写《一个清华人的自白》，受到朱自清的高度评价。可见汤佩松不仅在植物学领域贡献卓著，而且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吴老称其“热爱祖国”是切实中肯的；“热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至少意味着，在吴老心目中，只要“热爱祖国”就值得钦敬，无论是否“自由主义者”。

汤佩松也是“梅贻琦校长做清华留美监督时在美国的高材生”，曾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读本

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深造博士后。汤佩松还是吴老专业上的前辈和长期领导者：“在他主持中国植物学会的时期，我始终是他的助手，两次出国也是，……就是美国植物学会选举外籍终身会员，我们也是蝉联而来。”（第359页）可见在吴老心目中，“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专业领域做“自由主义者”的“助手”，不仅并无不妥而且心悦诚服乃至引为荣幸。而吴老更有如下自述：

我和佩松先生的学历几乎有点完全相反，当然也有相似之处，因为我所受的也还是英美式的教育。（第357页）

吴老早年读书时期未曾出国留学过，何以却自认所受“也还是英美式教育”？原因当在于吴老的植物学老师几乎皆为受过“英美式教育”者。就《随忆》所记吴韞珍、李继侗、张景钺三位“业师”而言，“他们都是留美的，也都是清华学堂送出去的。”（第358页）由此看来，吴老对“热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的钦敬，与他本人间接接受的“英美式教育”不无关联。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也不无内涵之异。学界常有“英美自由主义”话语。那么吴老自认所受“英美式教育”是否与“英美自由主义”相关？如果不可能完全无关，其所接受的又是哪些因素？下面笔者据《随忆》对三位“业师”的纪事片段试作管窥：

（吴韞珍老师）

吴先生从二年级植物形态学教起，每次来上课前，先已在大黑板上画和写满了，都是以当时国际著名的杂志（如Ann Bot, Plant an Archive, Bot Review等）有关文章摘录下来的新教材，黑板图画画得很精确，字写得很秀气，我们常需先来一个钟头或至少二三十分钟才能记成笔记。（第256页）

——可见吴老师传授的“英美式教育”，包含着敬业爱业、一丝不苟，以及随时追踪学科前沿新发展的探索精神。

（李继侗老师）

李老师曾于192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其毕业论文至今还留在该校。1934年他五年休假，又赴荷兰进修。李老师的突出特点是善于因陋就简，用最简单的材料和设备做出极具创造精神的成果来。他又极重野外调查和观察，在植物生理和植物分类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工作。……李师非常热心公务，他总是很少在屋，进出都是一路小跑，当时他可称联大第一大忙人。不但大一，连先修班他也管，而且是许多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或骨干。为了帮新毕业生或老职工找出路，他也揽下一些活。（第303~304页）

——可见李老师传授的“英美式教育”，包括重视野外考察，善于创制实验工具，以及热心公益事务等方面。

（张景钺老师）

张师于1920年清华官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得博士学位，是当时世界知名植物形态学家Chamberlain教授的得意弟子，而Chamberlain和Coulter合写的植物形态学，正是我在大二时向吴韞珍老师所学的教科书。……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亲身领会了张老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度。他在制作那一小瓶一小瓶固定材料时，总是那样细心和一丝不苟，特别是在用野外显微镜作预备观察时，总是那样细致，那样安详。（第259~261页）

——可见张老师的“英美式教育”传授的不仅是世界一流植物学成果，还包括与高端学术相匹



配的治学精神及为人风度。

“学术的源流师承对于后学的启发教育和培养都有莫大关系。”（第264页）因此《随忆》中还追溯及钱崇澍与陈焕镛两位“太老师”：钱崇澍曾率先在国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分类和微土金属影响植物生理的论文，是这两个植物学分支学科的开山祖。（第305页）陈焕镛先生“有西班牙血统，却是地道的广东人”；在建国初参加国际植物学会议上，“他那标准很高的英国式语言和精湛有力的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思想，使得与会的其他国家专家学者无不为之动容和惊异，报以热烈的掌声。”（第266页）

《随忆》所记植物学等前辈几乎皆为有英美留学背景者，他们令吴老受教益之处皆与杰出成就和治学精神相关。《怀念我的求学保证人——徐仁院士》的一段回忆是：“徐仁院士绰号Weismann（Wiseman），这Weismann正是我高中读过的《高中生物学》上有照片的奥地利遗传学家，想来徐仁先生学有专精，是个饱学的好校友。”（第297页）《纪念殷宏章先生》写道：“1938年他刚从美国Caltec回国，实在是我的老师辈，他是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最年轻的，时年才28岁。”西南联大时期，“殷先生常常设计和领导每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内容丰富，自由思考，发问发言极其踊跃，几乎成为大后方所仅有的局面。”（第331页）《怀念杨石先老师》中的杨老师于1922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归国后就任南开大学并创办了化学系。他在西南联大时期是大一《普通化学》课的主讲人。“联大时期注重学生基本训练，凡为本系一年级学生讲课的都是本学科最高明的‘通才’”。（第281页）《深切怀念吴中伦院士》的吴中伦院士曾是耶鲁大学硕士和杜克大学博士。他于1950年返国“当年就到黄泛区考察林业，并开始注意到杨树、泡桐等速生造林树种”。（第285页）由此可见，就吴老植物学专业范围而言，其最初开拓者与卓越建树者多为受过“英美式教育”者。换言之，吴老所受“英美式教育”，传授者未必仅限于其“业师”。如果说一流的学术水平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那么作为“英美式教育”的发源地，其“英美自由主义”的文化背景很可能为植物学研究提供过有益氛围。从而前者未必完全没有后者之因素。

因此，尽管吴老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尽力综合研究生物和生物圈的相互关系”（第358页），其实践过程贯穿的科学精神未必完全没有“自由主义”因素。“文革”中吴老因属“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关入牛棚，期间各种交代材料写了“四大袋”（第51页）。因此，至少就吴老在“文革”中被剥夺人身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遭遇而言，其对“自由主义”的相对合理性会有新感悟。吴老在“文革”中还失去过同样受过党的教育的老朋友“二汪”（汪志华与汪钱）。汪志华在西南联大时期与吴老共同参加过“一二·一”学生运动，建国初又同为中国科学院党支部成员，他当时组织起的研究所，成为以后中国“两弹一星”上天的“较强的力量”。然而“文革”中他却成为众矢之的而离开人世。汪钱是陈寅恪的学生，曾“奉党命”去动员陈寅恪回北京任中古史所所长，被陈“割席”而返后，却反被诬为“迷信反动学术权威”。汪钱想不通而服安眠药自杀（第278页）。由此不难想见，经历“文革”后的吴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至少与以前不一样。后者应该是吸纳了不限于科学研究范围的“自由主义”因素。同样不难想见，吴老对“自由主义者”汤佩松先生有如下同情之理解，客观上也是基于对“文革”式“辩证唯物主义”的某种反思：

汤佩松父亲汤化龙和梁启超一起是进步党党魁，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据台湾红学家周策纵《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和他的进步党其实是温和的改革派。然而这一切却使汤佩松在历次运动中成为“老运动员”而受批判。（第360页）

台湾红学家周策纵（1916~2007）早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哈



佛大学研究员及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等职。他长年工作居住于美国，其学术思想应该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吴老举其论著而再思汤佩松所受批判之荒谬，当也表明其“英美式教育”观未必完全限于自然科学方面。

吴老对“英美式教育”的认同并非毫无曲折。《平生风谊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2005年）中的胡秀英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博士”，也是中国植物学界的“老大姐”。由于胡博士长期生活在“美帝”封锁线那边，她独立完成的专业论著一度被吴老疑惑为“莫非是‘美帝’和我们竞赛出《中国植物志》？！”（第388页）直到1979年吴老在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胡博士后，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位看上去非常善良朴素，像是从农村刚出来的小老太太”；还知道她在中国植物志研究“两个疑难度最大”的菊科和兰科收集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次会见还促使胡博士将其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全部无偿赠予北京植物所。至此吴老心中的疑团终于消失。（第391页）胡博士热心于接待中国访美学者的琐事，其住宅几乎成为“美方在哈佛的接待站”；胡博士已年过耄龄，“还每天自己驱车接送这些不断头的客人”；胡博士还是位虔诚的信教徒，每饭不管有多少客人都要祈祷。吴老夫妇曾陪她去做礼拜，“虽然旁观，却也欣赏那沉潜肃穆的宗教氛围，信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主张信教自由的。”（第392页）可见吴老对“英美式教育”的接受，还从学术领域而有所扩展至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方面。吴老最后一次见面胡博士是在2002年她来访昆明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事的陪同下，“临别时她忽在我的右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老大姐对小弟弟的爱抚和告别礼节，不知所措。”（第394页）吴老总结与胡博士交往能够走得很近的原因，不仅因为当年都经历了抗战的艰苦岁月，也不仅由于同专业而又适逢祖国盛世，更因为：

同是从不同方向来的向一个目标前进的‘求真者’（pilgrim）。（自注：“求真者”是青年时代所写一首新体诗的题名，写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高原荒漠之后，“以隐喻学术界的荒凉寂寞”（第394页）。

而王元化学术精神之所重也正是“求真知”，其早期一部文集的书名是《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初版）。

“受到党的教育”的吴老与宗教信仰迥别的胡博士之所以由相知相敬到相谊，“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吴老对“热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汤佩松先生之所以钦敬感念，自然科学家的吴老与人文学者的王元化先生之所以成为情志相通的“老友”，原因在于都是“从不同方向来的向一个目标前进的‘求真者’（pilgrim）”。如果说吴老从早年所受“英美式教育”中也吸纳了某种“自由主义”，那么其核心首先是崇尚科学意义上的“独立之精神”和追求真知意义上的“自由之思想”。这也是我读《百兼杂感随忆》所受最大教益。

